

典藏品背後的迂迴曲折——以臺博館所藏「至哉坤元」匾為例

The Story Behind The Collection: A Case Study Of Zhì Zāi Kūn Yuán Tablet In NTM

蔡承豪 國立故宮博物院

Tsai Chang-Hao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四散與俱在

「物」是博物館的根本，並可謂是博物館的核心，其數量多寡、品質精良程度等等，皆大大影響了一個博物館的定位及發展。來自各方的民眾選擇到訪博物館，

常是為了那一個又一個平日深藏庫房、珍貴難得一見的文物而來，尤其是諸多重要的有機材質典藏品受三個月展期的保護機制，雖非是百年方可一遇，然而亦需因緣俱足方能親眼目睹，相當難得。

故除了文物本身的稀少、歷史意義、美學、工藝、知識等價值外，物件本身怎樣進入博物館也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課題。畢竟絕大多數的文物皆非博物館自己產生的，而是離開了自身原有的脈絡後，再歷經了種種過程方進入到博物館內成為龐大典藏群的一員。

此外，除了少數的藝術品其流動的兩端係僅侷限於「原擁有者／機構－博物館」這樣單對單的情況，大部分的文物在進入博物館之際，往往中間尚需經歷一個以上的中介者，有可能是國內外收藏家、特定團體、某個任務編組、政府單位等，使得文物在移轉的歷程中，所牽涉包括手續、購藏金額、未來運用方式之議定等等，皆增添許多複雜性。更甚者，由於牽涉到經費、特定展示任務、藏家自身意願等問題，移轉的物件往往並非僅是單件獨自搬移，通常會先匯集成一批數量不等的文物，經過人為操作後集體流向特定的博物館成為該館的典藏。亦即一件文物被抽離原歸屬同時，可能還涉及到更多原居

地、原藏者的其他物件（如同一個廟宇的各式物品、同一位藝術家各階段的作品等）。如此一個拉一個，使原各自互不相屬的文物們，變成同一個博物館的伙伴。而它原先的「鄰居們」或同被關注最後卻沒有進入博物館的文物，則可能又四散於其他典藏單位，亦或回歸原主，仍存於原居地。

「至哉坤元」匾

在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皮藏品當中，有一方題曰「至哉坤元」的匾額（文物標號AH000432）。匾額左側的上款為「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仲夏穀旦」，右側下款則署名「補用知府臺灣縣知縣白鸞卿敬立」，並鈐刻有兩方小印。根據典藏著錄資料，匾長240公分，寬80.5公分，厚度4公分，匾上之文字為陰刻，殘有金漆，無外框，亦無浮雕刻彩金等。

敬獻者白鸞卿，是一位長期在臺灣任職的文官。他原籍河南懷慶府，咸豐十年（1860）渡海任臺灣知縣，同治元年（1862）調署嘉義。後遭逢臺灣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其表現得宜，頗獲嘉獎。同治五年（1866）再任臺灣知縣，至光緒三年（1877）因故被撤換而止。這方同治十二年（1873）的

匾額正落在其任內，推斷應較可能原奉獻於臺灣縣境內的廟宇。白鸞卿的其他贈匾及題字，迄今仍散落於臺南、嘉義等地，當中最有名者莫過於原懸於縣署、現置於臺南鄭成功文物館的「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戒石銘。

「至哉坤元」典出《易經》坤卦之彖辭：「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意指大地資生萬物之德。乾坤為宇宙萬物的生元，分別代表著天地、陰陽、男女，由於「坤」同時也指涉女性、表示女德，「至哉坤元」遂被用於形容偉大的女性。而由於媽祖的女性身份及其垂憫世人的諸多神蹟，因此該詞便常出現在奉獻給天后宮的匾額上，以讚揚媽祖聖德。

臺灣其他天后宮亦有同樣題為「至哉坤元」之匾額懸掛於廟宇中，目前可知係為清代所創獻者，分別可見於臺南祀典大天后宮、麻豆護濟宮（乾隆五十八年獻）、雲林土庫順天宮（咸豐二年獻）、苗栗天后宮（光緒十六年獻）等廟宇恭懸此匾文於樑柱上供信眾瞻仰，分布甚廣。其中臺南祀典大天后甚至有兩方「至哉坤元」，一為同治二年（1863）江蘇候補通判鍾學義、分發試用通判徐寶強所獻，另一方則為光緒十六年（1890）臺南府知府方祖蔭進獻。可謂是臺地最常用以敬獻媽祖的匾文詞句之一。

臺博館的至哉坤元木匾，樣式與麻豆護濟宮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貢生黃大英所獻者較為相

似。雖相對於館藏中其他有色底或配有龍邊樣式的匾額樣式較為質樸，似乎也未曾用於展示中，卻可資作為臺地媽祖信仰的見證文物之一，並是館藏當中少數與媽祖信仰有關的匾額。且臺博館現今的建地即座落於臺北大天后宮舊址上，擁有這樣的典藏多少可與博物館的歷史略有呼應。

那這方匾額究竟來自何處？其為何會進入到臺博館？當中又涉及了哪些人事時地物？便有值得細究之處。且若然深入探查，更可能發現這是一場跨國流動下的結果。

來自海外的請求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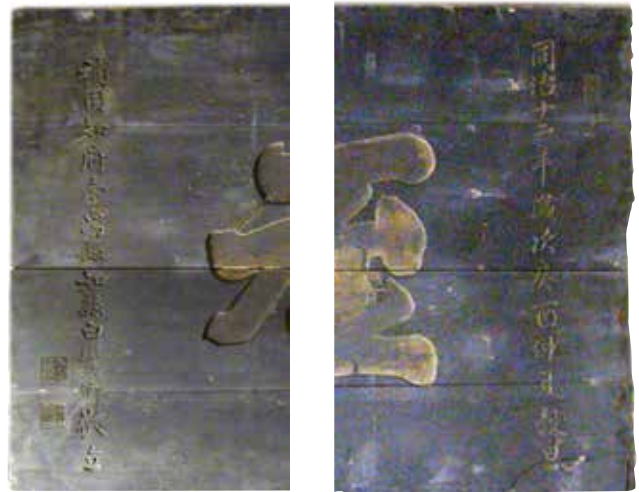
臺博館是臺灣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且長期以來一直是反映著臺灣在地特色的代表性博物館。其成立，係為了因應縱貫線鐵路南北全線通車，臺灣總督府遂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五月廿四日發佈第八十三號訓令，於臺北廳之下設置了殖產局附屬博物館，掌理蒐集、陳列有關臺灣學術、技藝及產業對所需之標本及參考品，並供公眾閱覽之事務，當時由於時間匆促，尚無法建築專屬館舍，遂利用舊彩票局建築物充作博物館。後配合總貫鐵道全通式，於同年十月廿四日正式開館。後新館建設、搬遷擴張、政權更迭、改隸等，迄今仍屹立不搖，見證臺灣的歷史歲月。其豐厚的典藏歷經各個時期不斷茁壯成長，面向亦趨多元，更是記錄這塊土地自然人文的重要見證。

臺博館的文物除原先來自明治三十二年（1899）成立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物產陳列館」之舊有農業、林業、水產、工藝、商業等館藏物品外，在博物館成立前，殖產局等單位亦借各式調查契機網羅自然標本及生活器物等多種物件，此刻便移轉至博物館，而總督府也通令各地方盡量呈送文物，以豐典藏。

在明治四十一年初開館時，博物館的典藏品計有12,723件，自然類藏品共計8,626件，佔所有藏品總數的67.8%，而產業類藏品共計有3,285件，佔所有



樣式樸實的「至哉坤元」匾額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至哉坤元」匾之上款(右)及下款(左)

藏品總數的25.8%。屬於自然史的標本佔了三分之一，產業標本佔四分之一，原住民及臺灣歷史類文物卻尚不滿一千件，可看出博物館頗傾向於自然科學領域；相對而言，人文類的文物就相當薄弱。如來自各地方捐贈的物件，仍以自然標本及產業為主，歷史類文物仍相當稀少。加以購藏經費有限，如何擴充人文歷史類的館藏便是一大挑戰。但卻因一項契機，讓至哉坤元匾額進入到館藏當中。

曾任職於總督府博物館、並被譽為「臺灣蕃界調查第一人」的森丑之助(1877~1936)，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臺北博物館的蕃族標本(原住民文物)，除了原先殖產部的蒐藏品外，還有加上接續承繼保存在警察本署、在蒐集送往東京帝室博物館陳列時的臺灣各種標本之重複品等少數的補充品。」森丑之助長期任職於博物館，自對館藏來源知之甚詳。除了一般熟悉的殖產部舊有蒐藏品外，他還點出了其實有若干文物，係來自於為了東京帝室博物館蒐藏之後的重複品，意即是一項非總督府博物館主動出擊，卻意外獲得的文物。

東京帝室博物館，即現今位於東京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是日本歷史最為悠久的公立博物館，甚具政治、社會指標性意義，可謂是日本代表性的門面博物館。該館起源可溯自明治五年(1872)文部省博

務局在湯島聖堂大成殿所舉辦博覽會，後幾經波折，博物館於明治十五年(1882)正式落腳上野，持續至今。期間歷經數度更名一文部省「博物館」、帝國博物館、帝室博物館、國立博物館，現則作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旗下的一館。

東博收藏品總數現達十一萬件以上，並含諸多重要國寶。豐富的典藏自非一日之功，隨體制的確立及後續規模的擴張，佳作入藏因素也更為多元，當中尚包含來自於臺灣總督府的協助。當時的臺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部分，自然成為該館常設展中介紹日本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環，館內設置有專門的展覽空間，固定展出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文物。

帝室博物館的臺灣相關展覽文物，除了來自於部分學者的調查所得，或是軍方調查行動後上呈皇室後轉移至博物館保存者，最大的一部分，來自於臺灣總督府的調查提供。帝室博物館前曾數次希冀總督府可以代為拍攝原住民影像及協助臺地漢人、原住民相關風俗物件，以為該館典藏並做展示之用。而收到母國最重要的博物館之請求，總督府自不敢怠慢，於各地致力收集千餘件的臺灣文物。無論常設展的展示其所欲呈現的所謂臺灣歷史與意象是否正確(或符合想像)，但服裝、住居、飲食、宗教、儀式、交通、音樂等類皆有，應已有足夠的文物數量及種類。

然至明治四十一年三月廿三日，帝室博物館股野琢(1838~1921)總長又再度發函總督府，希冀可以再次提供文物。公文中提及，鑑於去年總督府提供相關文物，使該館的展示及提供觀者觀覽有莫大助益，加以近年臺灣傳統建築的日漸減少，故商請總督府針對文廟敕額、文武官衙匾額、廟寺匾額、舉人進士匾額等項目進行蒐羅，以豐該館常設展中臺灣漢人文化的增設陳列品。

蒐羅行動的展開

漢式居宅、廟宇、樓閣、殿堂、祠堂等，多綴有匾額、楹聯等象徵品。匾額的象徵意義多元，如作為建築的名稱、呈顯擁有者的社會地位、反映居主的感情、並有彰顯餽贈者的心意等，不一而足。至明清時期，匾額型制幾乎已經十分完備，並滲透到人們生活中的各方面。而楹聯也稱柱聯，一般概稱為書寫或懸掛在門旁或柱子上的對聯。形式有多種，一是以墨汁或金漆直接書寫於柱壁上，或刻於木板後懸掛於柱體，亦可直接雕刻於木石上，講究者則更以金箔、牡蠣殼等黏貼。這些詞句多以兩句為一組，文辭本身承載著題字者或捐獻者的心意，更透露著書寫者的書法蘊底。

前述兩種物品，反映著漢人社會的對於建築的詮釋風俗，以及捐贈者、題字者、受贈者之間複雜的意義互換符號價值。在日人眼中，或許這是漢人空間內一種長時間被展示的象徵信物，值得注意。但在前一波的徵集行動中卻忽略了這些物件，或因如此，帝室博物館欲針對此類的物件著手補強，遂再度跨海致函，商請總督府進行協助。

面對帝室博物館的再次請求，臺灣總督府仍甚為慎重。但臺灣匾聯繁多，又多半物有原主，非是如常民文物般容易購得，如何取得且不造成紛爭著實需費心考量，後總督府決定以廢棄廟宇為中心。廟宇是地方中心，自有諸多匾聯。而廟宇因各種源由，有時也非能永維磐石之固，有可能係因信徒不再支持，或因改朝換代乏人照顧而荒廢，亦有可能因為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佔領戰爭下毀損。總督府總務局遂隨即通令地方各廳回報轄內有無符合之物件，若有捐贈意願者，即可加以徵集。

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資料可以得知，各廳在收到指示後，即展開調查並陸續回報，包括臺北、苗栗、臺中、斗六、嘉義、臺南、宜蘭等各廳等函覆表示境內有匾聯可供選擇。而細觀各廳提報近三十個的名單中，大體來源可分為數種：(一)文廟、文昌

廟之匾額，(二)媽祖廟：包含匾額、楹聯，(三)個人科舉物件：如進士、舉人、探花等象徵身份之匾額，(四)其他：如城隍廟、個人蒐藏、或未標示何種廟宇之匾額。當中數量最多者，莫過於出自媽祖廟的物件，共來自九個廟宇、十個物件。(詳表一)。

為什麼是媽祖廟？

媽祖信仰是臺灣重要且普遍的信仰，相關廟宇幾乎各地遍有，不少天后宮的樣式宏偉堂皇、且位處熙熙攘攘的市街中心，管理者、敬獻者亦多為各方重要官紳，匾文用詞更多為錦心繡口。即便總督府初始要求的係以徵集荒廢廟宇之匾聯為主，但部分媽祖廟卻仍成為目標。

(一)地方政治的因素

如根據總督府公文的記載，臺中廳大肚永和宮的「克配彼天」匾，便係來自於大肚公學校校長本多季三郎與大肚庄原區長趙璧的協議推薦。出身日本群馬縣的本多季三郎，明治卅八年(1905)年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隔年便至臺中公學校擔任教諭，後又派駐到大肚公學校擔任校長，成為地方重要的教育官員。而大肚趙家為當地之望族，曾擔任多個廟宇的管理人，永和宮即是由趙家人士管理，並曾參與出資修繕。為前清秀才的趙璧本身也兼任多家廟宇、神明會的管理人，對地方宗教事務甚為熟悉。而創建於乾隆晚期的永和宮為地方之代表信仰中心，在日治初期曾一度被軍隊佔用部分房舍，或因此面對臺中廳的徵集之下，即便未充分

表一、明治四十一年調查後媽祖廟匾聯徵集情狀

行政區	廟宇	文物	廟宇情況
臺北廳	枋橋街媽祖宮(慈惠宮)	楹聯	
臺中廳	永和宮	「克配彼天」匾	曾為軍用
	媽祖廟(或為石岡龍興宮)	不詳(前舉人林章國收藏)	
苗栗廳	天后宮	「恩普海甸」匾	曾為軍用
嘉義廳	慶誠宮天上聖母廟	匾額一枚	震損
臺南廳	安平天后宮	「永賴軒轅」匾	軍佔
		「與天同功」匾	
	臺南天后宮	「至哉坤元」匾	
宜蘭廳	宜蘭街天后宮(昭應宮)	「恩周赤子」匾	
	頭圍街慶元宮	「與天同功」匾	

資料來源：〈帝室博物館へ陳列ノ為匾額類送付其殘分移送ノ件(殖產局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1910年5月12日。



現存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帝室博物館發函請求提供匾聯文物之公文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調查報告中臺南廳所檢附的匾額草圖，第三方即為「至哉坤元」匾

知會地方，趙家仍先行決定將廟內的古匾捐出。同曾為日軍憲兵駐紮地的苗栗天后宮，可能或許也是基於某種擔憂方願意捐納。

另如臺南大天后宮的情況也頗為為曲折。隨著日本領臺，日本佛教勢力亦開始伸向臺灣，當時

臺灣諸多寺廟面對突如其來的異族統治，為求於動盪不安時期得以自保，遂先與日本宗教界締結主從本末的分支關係以圖穩固。後雖在總督府的制止下解除了這種關連，重回臺南三郊掌管，但由於目標顯著，仍多難避免因為國家的需求而做出某些讓步及因應。在這種情況下，臺南天后宮選擇捐出了由臺灣縣知縣白鸞卿署名「至哉坤元」匾，這個匾額在公文當中，並以簡易線描的方式予以說明。

這種廟宇完好、且依循原有的管理模式由地方執事者或仕紳維護，但因地方政治因素而提出可捐納匾聯者，可能還包括枋橋街媽祖宮楹聯、漢學家兼石崗公學校雇員林章國收藏的媽祖廟舉人匾額、宜蘭街天后宮「恩周赤子」匾，及頭圍街慶元宮「與天同功」匾等。

(二)「廢廟」徵集

至於被認為荒廢而可徵集的媽祖廟，表面上看來，徵集這樣的代表性廟宇文物應當是符合總督府之原意，實際上背後原因也頗為多歧。有因不可抗力情形而頹散者，如嘉義民雄的慶誠宮，係受明治卅九年(1906)3月17日的梅山大地震波及。此天災導致民雄地區屋舍建物幾乎全毀，慶誠宮亦難倖免，建築倒塌，文物損毀。天上聖母神像移祀他廟，原廟地又被徵為道路用地，遂成廢廟，文物也難以保全，故成為徵集的對象。

人為因素荒廢者則更為複雜。如有迫於日軍的徵用及佔奪情況者，係因日人為鞏固統治，在臺地部署相當軍力，但要找到合適的場地駐紮卻不容易。廟宇因有廣大廟地及諸多房舍，遂成為被徵用



另一方「至哉坤元」匾額，現懸於臺南大天后宮後殿，樣式與臺博館者有所差異 作者攝



宜蘭昭應宮的「恩周赤子」匾額現況，樣式仍相當完整 蔡旭清攝

的對象之一。如此情況下，廟宇管理者也無法妥善管理。安平天后宮即是這種情況。在鼎革之際，該廟因戰亂及軍佔而至香火冷落、棄置不用，並被陸續改為憲兵及安平郵便局的宿舍。安平居民雖於明治三十年(1897)向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提出〈請求安平天后宮給還書〉，但仍無法取回管理權，明治卅三年(1900)更被轉充作安平公學校(石門國小前身)教室。種種轉折下，原管理人對於廟宇文物失去掌控權，一旦有所徵集行動，便成為官方的目標。

為何會到臺博館？

而眼尖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前述臺南天后宮的「至哉坤元」匾，刻正典藏於臺博館內。但這原先要送赴帝室博物館者，為何會仍留在臺灣，並為臺博館所蒐藏？

在歷經明治四十一年年的調查後，考量事涉宗教敏感事務，總督府較為謹慎，並未立即下令募集。為求慎重，隔年六月總督府再次發文予有提出候選名單的各廳，要求其進行確認。



臺博館外之臺北大天后宮的石器遺跡及部分常民石材文物 林姿吟攝

隨著各地方於七月後陸續回報，果然有部分原擁有者欲撤回捐贈，或為避免地方人士的反彈而予以拒絕者。如苗栗廳的回覆便道出因寄贈方(天后宮)不便，故臨時提出取消寄贈。嘉義廳的慶誠宮匾額因樣式頗為粗糙，且破損嚴重，落款等已經脫落，鑑於如此，該廳遂認為已無寄贈的價值。臺中廳、宜蘭廳的相關媽祖廟匾額更直接消失在調查項目中。但也有出現更換的情況，臺南廳提出因原先捐出的安平天后宮「與天同功」，其題字因有一個破損、故替換為另一個「曇雲庇蔭」匾。官方如此的安排，更顯示安平天后宮原管理者對於文物已經失去掌控力。(表二)

歷經再次覆核，因各種因素原先媽祖廟匾聯的候選物件減至五個，且當中還有一方匾額替換，意即一半以上都有了更動。此外，總督府在十一月時，為確定捐贈者真正的意向，並協請警察單位深入訪查。而一經調查，再次發現有廟宇的管理者並非如同先前地方單位所呈報的情況。如安平天后宮的主事者們表示，在先前的五、六月間，臺南廳總務課長向安平街長張金聲(1859~1916)詢問寄贈意願，張氏先跟各保正協議，但皆表示原廟宇之物被帶離原地實不符合本地風俗，且將給該地帶來不祥，因此不樂寄贈。且初始並沒有與各管理者討論，故實無法提供。

而同樣為在地方眾人不知悉的情況下，大肚永和宮的克配彼天匾則仍然一如初始通報，運往臺北以供最後裁定。而臺南天后宮的至哉坤元匾，及枋橋

表二、明治四十二年寄贈意願更動之廟宇

行政區	廟宇	文物	變更原因
苗栗廳	天后宮	「恩普海甸」匾	寄贈方不便，臨時提出取消寄贈。
臺中廳	媽祖廟 (或為石岡龍興宮)	不詳 (舉人林章國收藏)	消失無紀錄
嘉義廳	慶誠宮天上聖母廟	匾額一枚	樣式頗為粗糙，且破損嚴重，故認定無捐贈價值。
臺南廳	安平天后宮	「與天同功」匾	題字有一個破損、故替換為「曇雲庇蔭」匾
宜蘭廳	宜蘭街天后宮	「恩周赤子」匾	消失無紀錄
	頭圍街慶元宮	「與天同功」匾	消失無紀錄

資料來源：〈帝室博物館へ陳列ノ為匾額類送付其殘分移送ノ件(殖產局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1910年5月12日。

媽祖宮的楹聯，經詢問管理人後皆得到肯定的答案。這些文物後陸續便運往臺北等待處理。

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一月，對於苦候已久的徵集請求，帝室博物館再度發函前來催促。總督府隨即在同月開始著手評判，以確立哪些匾聯值得送出。期間可能包括對匾額品質的審視、代表性的鑑析等等，惟詳細過程並沒有留下會議紀錄或審查報告。最後被選中送往帝室博物館者為枋橋街媽祖宮之楹聯，匾額類則未獲青睞。

而已徵集來、卻未被選送往日本者該如何處置？部分匾額仍可反映臺灣媽祖信仰，及呈現漢人的匾額文化，故轉送往臺灣自身成立不久的殖產局博物館蒐藏，應可豐富館藏且具備教育及展示之功能。總督府遂再度進行調查，逐一確認轉贈的意願。至哉坤元匾經詢問原典藏者，獲得同意轉寄贈殖產局博物館。而同年六月，殖產局博物館收下至哉坤元匾額，該文物自此成為藏館的一員，延續至今。

小結

博物館是收藏文物，並透過展示以呈現意義的公眾機構，而每一批文物如何進入博物館的庫房，其背後或多或少都有一段曲折離奇的身世與源由，甚至於是跨越時間、國界與地理的各種因素。明治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的這段文物徵集行動，呈顯的母國—殖民地、總督府—地方—民間互動往來的多重面向。一方樸實的至哉坤元匾額，正承載著這段迂迴曲折的故事。

參考文獻
〈帝室博物館へ陳列ノ為匾額類送付其殘分移送ノ件(殖產局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1910年5月12日。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丙午牛，〈蕃族標本の陳列に就て〉，《臺灣時報》32(1912年3月)，頁3-6。
東京国立博物館，《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
林鶴亭，〈安平天后宮志〉，《臺灣風物》26:1(1976年3月)，頁37-71。
曾淑卿，〈清代大肚趙家的發展〉。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樋口秀雄編，《博物館 講座第二卷 日本と世界の博物館史》。東京：雄山閣，1981。
歐陽盛芝、李子寧，〈博物館的研究：一個歷史的回顧〉，《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114-189。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
蔡承豪，〈多元匯聚的國寶聖殿—概說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蒐藏源流〉，《故宮文物月刊》406(2016年12月)，頁32-44。
錢瑾玟，〈臺南市媽祖廟群匾聯研究〉。臺南：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